

#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

——战后年代的精英大学及其挑战者

休·戴维斯·格拉汉姆(Hugh Davis Graham)

南希·戴蒙德(Nancy Diamond)

张斌贤 於 荣 王 璞 译

张 弛 校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巴尔的摩)1997年版翻译

# 目 录

总序.....	( 1 )
鸣谢.....	( 1 )
导言.....	( 1 )
第 1 章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起源.....	( 1 )
第 2 章 联邦科学政策的演变.....	( 17 )
第 3 章 “黄金十年”: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学比较 .....	( 41 )
第 4 章 回顾停滞的十年:20 世纪 70 年代研究型大学的调整阶段 .....	( 77 )
第 5 章 黄金时代的复归:20 世纪 80 年代的联邦经费和大学研究 .....	( 112 )
第 6 章 公立研究型大学.....	( 142 )
第 7 章 私立研究型大学和新兴大学.....	( 179 )
结论.....	( 211 )
附录.....	( 236 )
关于方法和资料来源的注释.....	( 260 )
注释.....	( 274 )
索引.....	( 357 )

## 总 序

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卡内基基金会在其《高等教育机构分类》(*A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1973)中提出的。制定这个分类的初衷是“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出于确信有必要创立一个能够鉴别大学的不同职能类型,并使其差别合法化的新的分类体系”。<sup>①</sup>这个分类为当时美国 2,800 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设计了一个多样化的分类体系,即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博士学位授予大学(Doctorate-Granting Institutions)、综合性大学和学院(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s)、两年制学院(Two-year Colleges)和专门学院(Specialized Institutions)等五大类。在博士学位授予大学中,又按照每年从联邦获得科研经费和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分为研究型大学Ⅰ类、研究型大学Ⅱ类和博士学位授予大学Ⅰ类和博士学位授予大学Ⅱ类。<sup>②</sup>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1973年),在当时全美 2,837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五大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是:

## 2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战后年代的精英大学及其挑战者

机构类型	数量	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173	6.1
研究型大学 I 类	52	1.8
研究型大学 II 类	40	1.4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I 类	53	1.9
博士学位授予大学 II 类	28	1.0
综合性大学和学院	456	16.1
文理学院	721	25.4
两年制学院	1,063	37.5
专门学院	424	14.9
总计	2,837	100

这个分类经历了 1976 年、1987 年、1994 年和 2000 年四次较大的修改,并计划于 2005 年再进行修改。<sup>⑤</sup>目前使用的是 2000 年的分类。这个分类与 1973 年的分类有了较大的变化。2000 年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把高等教育机构分为 6 大类,即:博士学位授予/研究型大学(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硕士学位授予学院与大学(Master'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学士学位授予学院(Baccalaureate Colleges)、副学士学位授予学院(Associate's Colleges)、专门学院(Specialized Institutions)和部落学院与大学(Trib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其中,在博士学位授予/研究型大学中,根据授予博士学位的范围,又分为“广泛型”(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Extensive)和“集中型”(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ies-Intensive)两类,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每年在不少于 15 个学科授予不少于 50 个博士学位,而后者每年在 3 个或更多的学科至少授予 10 个博士学位,或每年一共至少授予 20 个博士学位。在其余四大类(部落学院和大学除外)机构中,又根据学科的不同细分为不同的类型。

根据卡内基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2000 年),在全美 3,941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六大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是:

机构类型	数量	占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
博士学位授予/研究型大学	261	6.6
“广泛型”	151	3.8
“集中型”	110	2.8
硕士学位授予学院与大学	611	15.5
学士学位授予学院	606	15.4
副学士学位授予学院	1,669	42.3
专门学院	766	19.4
部落学院与大学	28	0.7
总计	3,941	100

自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讲话发表以来,“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和“研究型大学”逐渐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界普遍使用且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根据粗略统计,在我国1,000多所高等院校中,至少200所院校在其发展目标或战略规划中,使用了“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之类的字样。

同样,在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中,研究型大学概念出现的频率也不断增大。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等文献资源库上进行的调查显示,自1998~2004年,国内学者先后发表的有关研究型大学的论文超过了398篇。

应当说,在我国高等教育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很少有一个直接来自国外的名词或术语会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乃至影响我们对高等教育思考的“大观念”。

那么,我们(无论是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人还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究竟对这个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思维和行为的观念以及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意义,是如何认识的?我们的认识达到了何种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时髦的概念,一个流行的名词,还是在真正理解了它的本义之后形成的自觉意识,并在这种意识指导下制定相应的战略和规划?

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对于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思考与规划,不仅涉及一所大学自身的发展战略,而且事关一国高等教育的宏观布局结构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

展,需要有一大批具有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提供智力和人力的支持;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为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创造了客观条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究竟有多少所高等院校已经基本具备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条件?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提供多少众多研究型大学所需要的高质量的学生和教师资源?我国的国力究竟能支撑多少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

另一方面,既然“研究型大学”的概念(无论是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还是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位)直接来自于美国,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相当部分高校发展的“样板”,那么,就有必要广泛和深入地了解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由来,更主要地,是要把握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过去是如何发展的、现在又面临哪些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只有这样,研究型大学才不会只成为一个概念或流行的词汇。

我以为,如同高等教育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一样,一哄而起的建设研究型大学“热”,实际上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目前虚假繁荣和浮夸躁动的表征之一。作为学者,是难以凭借个人之力改变这种现实的(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学术工作为改变现实提供一些依据和工具。这是我和我的学生们近几年来之所以致力于大学史研究和编译《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是整体工作的一个部分)的主要出发点和目的。我们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至少能为我们的读者带来一些启发,以拓展和加深对现代大学和研究型大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在实践中减少一些盲目者、盲从者和盲动者。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探索译丛》(第一辑)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同事们(特别是王英杰教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王英杰教授对书目的确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我感谢我的学生们。几年来,他们的热情和辛勤的劳动激励我锲而不舍地完成这项工作。在与他们的共同劳动中,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非常有意的教益。

我感谢蔡冠深先生、蔡制侯先生和新华教育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本译丛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中美教育研究中心的一期研究成果,得到了新华教育基金会的积极支持。

我难以用言语表达我对河北大学出版社前社长宫敬才教授的谢意和敬意。他不仅把这套译丛列为该社“十五”的重大选题,而且不断支

持和督促我的工作。我深深感谢河北大学出版社的臧燕阳同志。三年来,他为联系版权等事务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

张斌贤

2007年1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 注释

①Hugh Graham and Nancy Diamond: *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Elit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ostwar Er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3.

②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A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Berkeley, Calif.: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973.

③<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

## 鸣 谢

我们的许多同事把他们的时间和关注慷慨地给予了我们的这项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值得特别提及。斯蒂芬·R. 马克斯(Stephen R. Max),现任马里兰大学研究生院(巴尔的摩)院长,帮助我们获得了一项研究拨款;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UMBC)的文理学院也在本研究的早期阶段给予了资助。范德比尔特大学的迈尔斯·古森斯(Miles Goosens),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计算机支持。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阿尔宾·O. 库恩图书馆(Albin O. Kuhn Library)的霍华德·科努勒斯(Howard Curnoles),提供了图书馆和计算机的支持,尤其是为我们提供了科学信息研究所的数据库。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艾略特·布朗李(Elliott Brownlee)和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s),不仅提供了数据,而且还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励,特藏室的图书馆工作人员黛博拉·肯尼迪(Deborah Kennedy)亦是如此。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罗伯特·J. 布鲁格(Robert J. Brugger)颇具思想深度的意见显然提高了本书出版的质量。特利萨·瑞弗斯妮达(Theresa Reifsnider)细心而准确地打印了本书的许多表格。

vii

克里斯托弗·汉弗(Christopher Haffer)和秦(Ching)以及温克·王(Wenke Wang)提供了相当多的计算机支持和分析;迪恩·雅特斯(Dean Yates)和詹妮弗·比沃蒙特(Jennifer Beaumont)在本项目早期阶段收集了数据。感谢罗伯特·斯宾尼(Robert Spinney)、罗伯特·斯科特·克拉艾特(Robert Scot Kraeuter)和布莱恩·霍尔(Brian

Hall)对研究的支持;感谢克雷格·坎普洛维茨(Craig Kaplowitz)为本书做了索引。我们还从美国教育部教育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帕特丽夏·Q. 布朗(Patricia Q. Brown)、美国农业部的蒂娜·巴克(Tina Buck)、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理查得·希尔维曼(Richard Silverman)、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的卡伦·弗格列·迈尔斯(Karen Fuglie Miles)、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会的苏珊·梅耶(Susan Meyer)、美国牙医协会的汤姆·伯格(Tom Berger)、美国护理学院联合会的萨拉·豪克斯(Sarah Haux)、美国医学院联合会的布鲁克·E. 瓦丁(Brooke E. Whiting)和唐纳·威廉姆斯(Donna Williams)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数据。

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的戈特列伯·C. 弗里辛格(Gottlieb C. Friesing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退休系主任理查德·S. 罗斯(Richard S. Ross)、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院的约翰·H. 哈什(John H. Hash)和威廉·斯查弗(William Schaffner)阅读并讨论了关于医学院的论述。理查得·W. 雷曼(Richard W. Lyman)、詹姆斯·C. 摩尔(James C. Mohr)、约翰·布拉克斯顿(John Braxton)和大卫·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阅读了本书手稿的其他部分,并提出了批评意见。乔治·拉诺(George Lanoue)提出了有益的建议。特别感激约翰·W·杰夫里斯(John W. Jeffries)的不间断支持和富有见解的意见。

呈现给诸位的这部著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之前的研究。其中大多数研究在正文中会提到,我们尤其倚重罗杰·盖格(Roger Geiger)的著作,尤其是他的两卷本美国研究型大学史。我们还应提及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的慷慨之举,他让我们分享了尚未公开的资料,帮助我们了解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发展史。最后,我们要感谢诸多同仁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提供的可贵且有意义的合作,感谢我们的家人珍妮特·格拉汉姆(Janet Graham)、马克·戴蒙德(Marc Diamond)和丹尼尔·戴蒙德(Daniel Diamond)所提供的支持,这种支持对于我们至关重要。

## 导 言

这是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著作。<sup>[1]</sup>在本书中,“兴起”(rise)具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指的是美国大学在为获得认可和声望的国际竞争中所取得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学者和科学家团体中并没有得到广泛尊重的美国大学,现在却跻身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并赢得了声誉。这一断言尽管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颇具争议,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却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获得广泛的承认。1983~1993年间担任美国大学联合会(AAU)主席的罗伯特·M.罗森兹威格(Robert M. Rosenzweig)在1982年曾写道,全世界大多数有见识的观察家都会认为,以几乎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出来的标准来判断,美国研究型大学都肯定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罗森兹威格接着写道:“这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很少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在美国清楚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以至于维持其存在的观点几乎是无需进行仔细讨论的。”<sup>[2]</sup>“我们选择集基础研究、有一定程度交叉的应用研究、以研究为目的的人才培养和本科生教育为一身,在同一个地方、由同样的人员而且往往还是同时来开展上述这些工作。针对这个变化多端的集合体产生的种种问题,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证据,都无法为反思这里所选的道路提供依据。”<sup>[3]</sup>无论是根据诺贝尔奖的分布,学生入学和教师职位的国际申请数量来衡量,还是根据声誉调查的结果来衡量,美国大学的声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已快速上升。

研究型大学“兴起”的第二重含义,包含着战后美国大学在研究事

业的彼此相互竞争中所取得的相对成功。在尤有竞争性的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市场中，实力强大的新兴研究型大学兴起而提出挑战，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取代了老牌精英大学的位置。传统的成就与认可的等级制度被颠覆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大学在国际范围的兴起，以及其他一些相似的原因。高等教育环境中那些帮助战后美国大学统治了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受到联邦研究资金支持的分化多元、竞争激烈的学术市场——的特殊属性，鼓励有抱负的大学采取创新和冒险的举措。因为这种竞争产生了赢家和输家，诞生了新的研究型大学，而且这中间最好的大学，还取代了传统老牌大学的位置。

也许这种有争议的断言——即战后美国大学中既有新的明星大学的兴起又有老牌精英大学的衰落——在大学之间体育竞技的领域中可以找到现成的证明，但在研究领域内却找不到。在 20 世纪 50、60 和 70 年代进行的美国大学的声誉调查，揭示出学术地位排名具有显著的稳定性。<sup>[4]</sup>在争取进入前 20 名的排行竞争中，几乎看不到一所新大学的面孔。美国的大学常常自诩为世界一流——它们通常是常春藤老牌大学、中西部和西海岸的大州立旗舰大学——这些学校在教师和研究生教育声誉调查中也同样处于前列。随着战后美国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所有的大学都有了较快发展，所谓水涨船高，但很显然它们的先后次序却变化不大。

但是，在动态的竞争次序和静态的成就等级之间的不平衡，却令人困惑。美国研究型大学获得了杰出的国际地位，这种兴起是以一个分散、多元的学术市场的发展作为基础的。在这个市场当中，竞争的压力使得美国大学的变化速度要比世界其他国家那些受庇护的公立大学快得多。1945 年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国防的需要，婴儿潮，史无前例的高校扩张，以及一大批新的联邦政府支持项目的出现，所有这些都加剧了竞争的压力。然而，在美国，大学国际声望排行的重新调整，还是没能相应地派生一个有关大学杰出研究才能的国内排行。为什么呢？

几个似乎合理的解释，有助于说明即使在面临史无前例的战后变革的情况下，大学的研究能力排行还保持较高稳定性的原因。<sup>[5]</sup>以学术终身制为基础的研究型大学，是对快速变革具有抵抗能力的复杂机构。对于私立名牌大学而言，大量的捐赠基金允许它们在研究能力方面给

③ 以相当大的投入，大学自治的制度又避免了影响那些公立大学竞争者

的程序性限制因素。对于大州立大学而言,公共服务和政治网络的产生,为使旗舰大学的利益免遭平民党论者侵犯提供了保护。对于在专业和学术性学科中一流的学者而言,大学声望成为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它吸引着拔尖的人才,以维持其已经建立起来的领先优势。对于政府、企业和大基金会而言,衡量研究投资的最好标准,就是得到证明的一流大学的绩效。

不过仍有若干理由要质疑已建立起来的大学等级制度的可靠性。有关声誉排名的诸多研究已经发现这些排名对于大机构的一贯偏爱。<sup>[6]</sup>这些排行通过夸大学术“明星”的权威来制造“光晕效应”,从而提高了一所大学中其他个人和项目的地位。<sup>[7]</sup>不仅如此,它们还有时效性差的毛病,允许大学以过去的声望来掩盖其后来的衰退。由于声誉调查在信息内容方面往往比较薄弱,因而它们传达出的东西也许是不准确的。随着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学术领域日益向专门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已有一百多所大学要求它们的教师为所在系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自己的教学效果评定等级。这些由诸如美国教育理事会(ACE)和全美研究委员会(NRC)资助性组织设计的经过分门别类的项目评定,其目的在于能够适用于任何一门学科。但有关研究生课程的排名,还是不断地被其他学者重新合计到主要大学的排行当中,后者通常只包括少量名列前茅的大学(20或25所)。与此相对照,客观性排名显然已涵盖了更多的大学,并且避免了由于时效性差而带来的曲解。这些排行在关注数量积累的过程中,注意同时兼顾数量与质量。学术机构难免不受《吉尼斯大全》(*Guinness Book of Records*)做法的影响,纷纷为获得在数量上的高排名——获得最多的研究拨款数额,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最多,图书馆馆藏数量最大等等——而竞争。这种传统重视大学的规模,但却轻视或者忽视经费产出效益的重要性。

尽管有声誉排行和客观指标的证据,但这样说似乎是有道理的,即二战后半半个世纪里美国高等教育的空前变革,所带来的大学研究的质量和研究成就方面的变化,比有关教师和研究生教育的周期研究和声誉调查所显示出的变化要更大一些。为了验证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些变化业已发生,但却为评估大学绩效的标准方法所遮蔽——我们需要设计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方法要能够完成评估自1945年后大学规模受到控制以来,为数众多博士型大学所发生的变化这一令人望而生畏

[4]

的任务。因此随之而来的研究,就要建立在过去美国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但是,它又在七个方面有别于过去所作的大多数研究。

首先,本书着重研究大学的任务之一:即新知识的创造。这只是大学的几个重要任务之一,而且有人还认为它并不是大学最为重要的任务。所幸的是,有一部完整的文献论述了大学在本科生教学、研究生教育、专业训练和大学生活质量方面的任务。这部从保守与激进的两个视角来写作的文献,以一种特别有力的方式,对现代大学、尤其是将教授头衔授予那些得到研究资助但却不具备资格的人的做法进行了笔伐。<sup>[8]</sup>我们认为在大学这样一个独特的具有多重目的的机构中,着重强调研究的任务是人为的。但是,几乎没人会质疑知识创造是大学的核心使命,质疑未来的知识经济中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或者反对大学在知识创造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学术繁荣和国家富强而言至关重要的主张。

其次,本书的分析是具有历史性的。它叙述了有关联邦研究政策的沿革,以及公立与私立大学中研究快速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其跨度从1945年至1995年,着重深入探讨了1965年至1990年间的情况。其基础是一种既强调美国建国的历史特色,又强调美国高等教育分散、多元且具竞争性的独有发展历程的学术体制。为了组织好涉及了如此多的大学的文字叙述,我们特别强调联邦科学政策的基本点,强调为过去的几十年提供了某种特征的共同背景——20世纪60年代扩张主义的“黄金时代”,70年代的紧缩调整,80年代对企业家精神气质的追求以及90年代越来越灰暗的前景。

第三,我们对200多所大学的教师的研究绩效进行了比较。尽管

[5] 对于研究生课程的研究包含了大多数博士型大学,但它们还是避免了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多数有关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已经对少数有声望的大学进行了重点研究。罗杰·盖格(Roger Geiger)的两卷本《20世纪美国研究型大学史》就极大地减轻了我们的研究任务,这是一部很棒的著作,它集中研究了16所精英大学。<sup>[9]</sup>正如斯蒂芬·格朗伯德(Stephen Graubard)所说,只有将存在于更多的博士型大学中的各种大学的类型与规模包含进来,而不是仅仅研究屈指可数的几所声名显赫的大学,我们才能理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高等教育所发生的

一切。<sup>[10]</sup>

第四,我们衡量的基本单位是整个大学,而不只是挑出来的某些部分,比如系里的研究生课程或者专业学院。战后时代的主要比较研究,如由美国教育理事会(ACE)资助的卡特(Cartter)和路斯-安德森(Roose-Andersen)评价研究(分别于1966和1970年出版),和全美研究委员会(NRC)在1982年和1995年所作的研究,都是把主观数据(主要是声誉调查)和在某些学科领域研究生课程的客观数据结合起来,来进行大学绩效的比较的。<sup>[11]</sup>他们将评价限定在特定项目的排行上,试图去避免那种旨在找出“名列前茅”的20或25所大学的简化的“排名竞赛”。<sup>[12]</sup>对于文理学科和工程学科当中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研究生课程来说,这些重要的研究为需要广泛视野的全国性比较提供了基本指标。但它们却都有一些共同的缺陷:采用的是主观调查数据,客观的数据则只限于某一些项目。它们都从没有衡量过大学所有教学科研单位的整体绩效。<sup>[13]</sup>

第五,为了避免把数量与质量合二为一,同时为了弥补我们所谓的在整体产出绩效基础上参与排名的大学的“实力”问题——例如,根据得到联邦研究与开发(R&D)基金的数量来对一流大学进行排名——的不足,我们按照大学的规模来决定对其研究活动进行衡量的方法。为此,我们根据某个大学内全职教学人员的数量,划定评价教师绩效的不同指标。这就产生了一种人均衡量的方法,从而使我们可以对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大学在一段时期内的绩效变化进行比较。<sup>[14]</sup>

第六,本研究包含了衡量学术领域研究成就的量化方法。这些方法在科学和工程学中是很常用的,在这些领域,常常要对研发经费和期刊的数量进行统计和比较。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些方法却很少见,人文学科领域则更是罕见。本研究依据的是一套有关1965~1990年间5个学科门类研究绩效的核心数据。它们总体反映出了科学、社会与行为科学、人文学科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创造力的情况(见“关于方法与资料来源的注释”)。

⑥

最后,我们所进行的大学研究工作比较,要求进一步打破将医学学科与大学的其他学科分隔开来的藩篱。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美国大学的黄金时代,但是根据历史的标准,理论医学的黄金时代却要追溯到1946年。当时希尔-伯顿医院调查与建设法案(the Hill-Burton Hos-

pital Survey and Construction Act)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医院和医学院补助金联邦计划。虽然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大学学术研究的最大资助者,同时生物医学也一直在世界科学和学术杂志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这巨大事业中的大学研究者群体却已经被大学自身的“柏林墙”分裂了。在历史上,学术性的医学院就在大学中享有特殊的自治,它们通过一种集财政资源、临床责任、专业传统和声望,以及将它们与大学社会其他部分区分开来的报酬标准为一身的独特性质,赢得自身独立的地位。

关于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在类别划分上却非常相似。图书馆关于大学的书堆满了书架,但其中却极少提及理论医学方面的伟人,而关于医学教育和临床医学研究的书籍,则完全局限于教学医院和受到大学资助的生物医学研究者这个狭窄的范围。对于这由来已久的深深界限,我们并不希望人为地去打破。但在后面的文字当中,我们努力想将这两个世界重新接合起来,在一个共同的参照框架内描述和比较它们的绩效,承认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在机构上所具有的共性。如果根据预期,在 21 世纪理论医学将遭受一场广泛的财政危机的话,那么整个大学社会都会受到冲击,并将长久地遭受其后果的影响。

7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1945 年以来新兴的研究型大学的确在挑战传统精英大学统治地位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它们的表现比人们所认识到的还要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成功多年以来都被排行竞赛的强大传统所遮蔽。我们在本书中自始至终都保留着这样的发现,其中许多发现非常令人惊讶。在把我们的研究方法应用到 1965~1990 年间的数据中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关于研究绩效的几种模式同样地是令人惊讶的。其一是私立大学在战后年代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充裕的经费、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它们具有不受立法机关和公共官僚机构施加的日益增强的种种限制的自主办学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大学竞争加剧,与此同时,国家的控制也日益加强,私立大学利用它们所拥有的相对自由,避免了政府的控制。

大学在争取研究学者和资金的竞争中占有优势的第二个来源是在大学中的医学院的存在。就大学健康医学中心而言,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并非始于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结束于 20 世纪 60 年代。

而是开始于 1946 年的希尔—伯顿法案(Hill-Burton Act),并继而受到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预算的增长,以及以强化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制度(Medicare and Medicaid)为己任的“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发展的促进。在战后时代,联邦对生物医学研究的资助水平增长得非常快,真可谓突飞猛进,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第一次与有了不祥征兆的国家财政现实发生了抵触。

在战后时代,大学优势的第三个来源,则只限于公立大学领域,它与我们这部著作的中心问题——搜寻正在出现的新兴精英大学——关系非常密切。这就是那些被指定具有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地位的公立大学所拥有的优势,这些大学得到了国立大学体系的特别保护和扶植。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UC)和纽约州立大学(SUNY)。耐心的读者要等到最后一章才能看出这种指定地位让人吃惊的特别之处,它使得像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这样的大学以很快的速度跃升。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建立时是一所州立师范学院,1944 年作为工艺师范学院加入到加州大学系统当中。<sup>[15]</sup>

人们对受市场驱动的企业主义所作的批评认为,战后时代里四年制大学过多,这类学校自称是“研究型大学”,但却缺乏与这个名称相联系的实质内容,它们重视一些微不足道的研究,却将学生置于严重不利的地位。对此我们表示赞同。但我们并没有提出具体进行判定的标准,例如,去判定“第二旗舰”大学群的创立,具体在哪点上建立起了健康的州内竞争,并更好地为地区利益服务,或者判定以研究为目标的大学数量的增加,或通过一种类似学术格雷沙姆法(Gresham's Law)来建立研究型大学,具体在哪个方面只会“降低”旗舰的水平。因为本书主要是一部关于历史和比较的著作,而不是关于理论或者规定的著作,读者可以对不同的管理体制哪个更成功一些,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一个州行得通的模式,在别的州可能就会失败——如加利福尼亚的三轨制(tripartite system),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时其他一些州曾热衷学习过,但当它离开加州时,似乎就已经失败了。幸运的是,对于美国而言有 50 个州的系统,截止到 1990 年,有 130 多所公立的和 70 所私立的博士型大学。本书的论点之一是,美国分权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统,为长期以来它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批评家们争相针砭的对象,提供了一个学术

市场,正是在这个市场中,战后年代的研究成就竞争才得以兴盛。

在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结束 50 年后,有证据表明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也可能行将终结。大多数跨入到 21 世纪的 20 世纪 90 年代的项目,其联邦预算说明书都反映出联邦对研究的支持经费和对学生的资助严重减少。国家卫生保健产业方面的变化,加上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经费的严重削减,可能使长期以来是医学中心收入主要来源的大学医院,变成为大学的财政包袱。为赤字所累的联邦政府所采取的紧缩开支政策,可能会破坏使大学的研究经济(research economy)蓬勃发展的原动力。

但是情况也许并非如此。我们此前就听到过杰里米亚(Jeremiah)在美国学术界的各种场合所作的大声呼吁。我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半个世纪的历史分析,强调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不同寻常的顺应能力。我们的战后历史证明了这一系统具有在分权、多元、竞争的环境当中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形势的能力。我们并不否认,大学系统为适应环境,维持生存的代价往往过高,尤其对那些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学院和大学而言更是这样。这种代价包括被降低的标准、学术上追求时髦、教学质量下降、贩卖假文凭,而对某些大学而言就是最终的倒闭。但是在一种日益依赖于高层次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全球经济当中,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双重兴起,还是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双倍的成功。本书就试图描绘出这段历史的轮廓。